

載於 *青年研究學報* 2006, 9(1), 頁 3-14。

香港的跨代貧窮問題 及其治理策略

黃 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的數據源自黃洪與李劍明所進行的「香港貧窮線研究: 跨學科的分析」, 有關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角逐撥款資助」(編號: CityU 1184/99H) 資助, 才能順利進行, 謹此致謝。

聯絡電郵: hwong@cuhk.edu.hk

香港的跨代貧窮問題及其治理策略

摘要

本文根據香港貧窮線研究的調查資料，選取出 368 個至少有一名處於 15 歲至 21 歲青年成員的住戶，以了解成人及青年的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的數量與質量、以及成人及青年的社會排斥對有關住戶的貧窮水平的影響。結果顯示住戶的貧窮水平與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成人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相關，而較少與青年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相關。而根據回歸分析，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力依次是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成人教育水平及社會網絡數量，而青年教育水平、社會網絡質量以及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的影響力不明顯。研究提出一個較全面的扶貧策略，建議政府的扶貧策略應同時集中貧窮的青年與他們父母的一代，而非單單聚焦於青年的貧窮問題，亦不應將大部份資源向青年一代傾斜，而忽視其建設上一代的人力資本及解決其社會排斥的問題。

關鍵字：跨代貧窮，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社會排斥

The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problem and its alleviation strate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Hong Kong Poverty Line Study, this study select 368 households with at least one youth household member at the age from 15 to 21.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adult and youth human capital,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family and the adult and youth social exclusion from labour market on the poverty level of the households. Poverty level of the households was found to be correlated to the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ult exclusion from labour market, but not youth exclusion from labour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on impact on poverty level, the degree of impact was as follows: adult exclusion form labour market, adul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quantity of social capital. The author suggests a more holistic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which the policy should target on both the poor youth as well as their parents. Moreover,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not just incline to the youth and neglected the building of human capital and solving the social exclusion problem of their older generation.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social exclusion.

前言

貧窮問題與扶貧工作不單是各地政府面對的主要課題，亦是各個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的主要關注議題。然而，過去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努力並不足夠，貧窮仍然未能真正被根治。貧窮問題始終是在發展中國家以至已發展國家中首要解決的問題，香港亦不例外。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出香港兒童及青年的貧窮率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在 1991 年，15 歲以下兒童以及 15 歲至 24 歲青年的貧窮率分別是 18.9% 及 9.5%。及至 2001 年，有關貧窮率分別上升至 24.1% 及 15.4%。在 2001 年有超過二十六萬名兒童及十三萬名兒童青少年生活低於以香港同樣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標準的貧窮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04)。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失業率由 1997 年的 10.0% 大幅上升至 2005 年的五至七月份 29.1%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4)。而在 2003 年，有 145,200 名綜援人士的年齡少於 18 歲，佔全部青少年人口的 11%。

香港的貧窮問題以及青少年貧窮問題的惡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民間社會一直要求政府設立跨部門的委員會，專門處理貧窮問題。及至 2005 年，特首董建華在辭職前仍採納有關建議成立了扶貧委員會，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扶貧委員會成立後便設立了兒童專責小組，目的是為了減低跨代貧窮機會，研究為兒童及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的相互協調；以及推動社區資本，培育下一代健康的均衡發展。小組並設法促進現有工作計劃的成效及銜接，務求充分滿足青少年，尤其是待業和失學的青少年的需求。扶貧委員會提出要針對兒童貧窮和跨代貧窮問題的願景，但提出的策略和方向主要是重申現行著重教育及人力資本投資的策略，較少提出新的政策路向。

在眾多貧乏的社群中，青年被視為重要的扶貧對象，亦是成功扶貧政策的希望。世界銀行便認為投資於兒童及青少年的人力資本是解決跨代問題的希望(Children & Youth Team, 2005)。過去大量研究亦證實貧窮對兒童及青年的發展有負面影響。在貧窮家庭長大的青少年較高機會出現身體及精神健康的問題，而且其社會資本及人力資本亦容易出現不足的情況。對於青少年失業、吸毒、犯罪以及精神健康的研究，均指出青少年貧窮的背景均對產生這些問題相關，但不同類型的青少年所受的影響程度會有所不同(MacDonald & Marsh, 2002; Costello et al. 2003)。

協助青少年發展被視為解決家庭及國家的貧窮問題的最有效途徑。近年，香港以至

內地市民積極支持不同的計劃支援內地貧窮地區辦學，便是中國人社會支持上述看法的明証。基於儒家的傳統思想，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以教育扶貧」及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筆者同意上述發展教育來解決兒童貧窮的方向，但是除了人力資本的投資外，海外的研究及實踐提出了更多元的看法。不同理論取向如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社會排斥的研究對貧窮成因有不同的理解，亦對要發展青年的那一方面提出不同的優先次序，亦為那些政策才能有效協助青少年脫貧有不同的觀點。

香港非政府組織對青少年的貧窮問題日益關注，但進行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分析貧困青少年的特徵以及其心理及社交狀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00)。此外，部分學者集中研究青年人對貧窮的主觀看法 (Shek, 2002a) 以及父母的質素如何影響青年的行為及生活(Shek, 2002b)。本文嘗試補充上述研究，集中分析不同因素對有青年的家庭貧窮程度的影響，以其能對有關跨代貧窮的政策提供有實據的分析。令有關政策更有效地協助貧窮家庭脫貧。

無論是本地及海外，眾多有關兒童及青少年的貧窮研究多集中貧窮對兒童及青少年的負面影響(Jones et al., 2002)，部份則集中貧窮對青年作為兒童到成人的過渡之影響。不少研究提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理論作為解決兒童及青少年的貧窮問題的依據。

在宏觀層面，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被認為是扶貧工作的關鍵。健康及營養的改善會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力，以及提高學生的表現。在發展中國家，教育，尤其是小學基本教育，被認為可以提高生產力、收入、以至非經濟性的成就，所以人力資本的投資有可觀的回報(Psacharopoulos, 1998)。人力資本論者的研究發現對青年健康及教育的改善，對家庭的收入水平以及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微觀的層面，教育水平的高低是決定個人成人時社會及經濟地位的關鍵(Hill & Sandfort, 1995)。人力資本論認為受較好教育的人士會更容易找到工作，若留在勞動力市場，亦會較少機會失業，而好的資歷亦會帶來更高的薪酬(Krueger & Lindahl, 1999)。這些均是人力資本帶來的正面微觀影響。

另一重要的理論取向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論，它強調社會網絡的破落以及缺少對公民社會的參與是產生城市貧窮的主要原因(Wilson, 1996; Putnam, 2000)。社會資本通常以三種不同形式來出現：「責任與期望」、「資訊管道」及「社會規範」。「責任與期望」及「社會規範」透過獎賞或制裁個人行為提供準則，而「資訊管道」是指利用社會關係取得資訊 (Coleman, 1988)。這三種社會資本形式往往都是透過建立網絡而得以

體現。根據 Coleman 的理解，社會資本是從社會聯繫、社會網絡中的成員，以及眾人共有的規範，而所累積到的公共資源。社會資本令個人、組織以及社區可以更容易解決集體的問題。在一個缺乏信任以及不守規範的網絡中，個人傾向不與其他人合作，因為未能保證他人會有同樣的行為和做法。

Putnam (2000) 指出有證據顯示社會資本是繼貧窮之後，最重要的因素影響兒童日後生活的廣度和深度。當貧窮與青春期成孕、死亡、沒有工作等相關，社區的參與正好有相反的效果。Saegert, Thompson and Warren (2001) 則指出社會資本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在社區內建造連結/內部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在社區內發展出強大的社會連結及有效的組織可以窮人發展其能力用來對抗貧窮；二是在社區之間培育橋樑/橫向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亦即是說在不同社區之間建造信任及合作，這可以強化整體社會的社會脈絡，令社會有共識對抗貧窮；最後是與社區之外的金融及公共機構加強聯繫，建造聯繫/縱向社會資本(linkage social capital)。由於被主流經濟及政治組織的忽視，貧窮社區的社會資產可以並未有效發揮，所以社區內的組織需與企業以及政府組織協作，產生協同效應。

但是亦有論者如 Portes (1998) 指出社會資本論的看法是新瓶舊酒。很多提倡社會資本論的論者並沒有重視社會資本的缺點和局限，例如並沒有具體及有說服力的說法提出如何能解決公民參與不足的問題，另外亦沒有分析社會聯繫亦有負面影響如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以及防止外人加入等等。

而另一對扶貧政策有重要影響的理論是「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理論。而這理論對英國政府及歐盟的扶貧窮政策有重要的實質影響。「社會排斥」是一多向度的概念，它包括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弱勢與匱乏。「社會排斥」既是一個過程亦是一個結果。首先，由於收入低、對參與就業、以及社會福利及服務的使用又有限制，個人或群體被部份及全部排拒，無法參與社會，包括文化及社區生活。(Berghman, 1995).

社會排斥的出現並不是單一因素。長期的低收入、缺乏職位、居住所在的社區，未能使用教育、醫療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等等同時出現，往往會造成一個困局令有關社群陷入一個嚴重的困難境地。很多研究指出對於大部份人來說，對兒童的社會排斥大部與對這些兒童父母的社會排斥相關。很多政策制訂者均關注經濟困難對青少年發展及成就的影響。社會排斥對年齡幼少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尤為深遠，這令部份的兒童未能獲得醫療及學前教育，令他/她們無法在開始人生時有同一的發展機會與經驗。

簡單來說，過去有關兒童及青少年貧窮以及跨代貧窮政策的研究多以上述「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社會排斥」三套不同的理論視角來分析貧窮的成因，亦基於有關成因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對貧窮兒童及家長更好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強及豐富貧窮家庭的社會資本、消除對兒童及家長的社會排斥是三套不同理論的政策建議，而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理論均指出上一代有關資本的數量及質素均對下一代的有重要影響，會出現跨代的影響。本文將嘗試在香港的脈絡中，分析究竟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社會排斥」這三種不同因素，以及究竟是父母一代還是青年一代的處境對住戶的貧窮水平有較大的影響？

研究方法

本文的數據是源自黃洪及李劍明(2001)「制訂香港貧窮線:跨學科研究」(香港貧窮線研究)。該研究在1999年9月至2001年1月期間進行，按規劃統計小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及住屋類型作為分層單位，以隨機抽樣方法在全港住戶中進行抽樣調查，成功訪問了3,086個居住於低收入地區(地區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位於全港最低百分之三十之規劃統計小區)之住戶。研究亦特別在抽樣中包括包括木屋區及平房區的住戶，有關抽樣包括了絕大部份全港陸上的貧窮住戶。香港貧窮線研究的問卷調查以面對面方式進行，由住戶中自稱為戶主的成年人進行作答。調查訪問居住在該單位中所有的住戶，包括板間房、套房等中的住戶。

香港貧窮線研究之主要目的是了解這些家庭的開支模式及生活狀況以制訂香港的貧窮線；而研究亦會分析貧窮戶的特色、消費模式、工作狀況、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情況。在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部分，我們嘗試量度被訪者「社會排斥」及「社會資本」的情況，有半數即1,502個被訪者接受了這部份的訪問。本文便是利用這部份的數據了解「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社會排斥」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成人及青年的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的數量與質量、以及成人及青年的社會排斥對有關家庭的貧窮水平的影響。筆者在貧窮線研究的數據中選取出368住戶，住戶中最少有一名青年成員的年齡處於15歲至21歲。香港法定最低工齡為15歲，所以以此為起點。而21歲是大部份青年人完成高等教育後的畢業年齡。由於本研究集中於青年及成人社會排斥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所以集中分析那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少年，所以與聯合國對青年的定義有不同，將22-25歲的家庭成員視為成人。

量度工具

以開支為基礎的量度貧窮指標，不單反映貧窮住戶所擁有的資源，更加是其消費的需要，本文採用人均住戶開支水平作為貧窮水平的指標。各住戶的貧窮水平(PL)(以10,000元入息計)是人均住戶開支的倒數

$$PL / 10000 = 1 / (\text{住戶總開支} / \text{住戶人數})$$

教育水平的量度

個人的教育水平(EA)被劃分為1分(文盲/幼稚園及以下) to 6(大專教育)。「成人教育水平」(ADEA)住戶中所有21歲以上成人教育水平的平均數。「青年教育水平」(YEA)是住戶中所有15至21歲青年的教育水平平均數。教育水平是一簡單及易量度的指標來量度個人的技巧及能力，是人力資本的重要指標，但不足之處是未能反映在非正規訓練以及在工作經驗中所獲得的人力資本。

社會網絡的量度

社會資本通常定義為擁有共同規範、價值及理解能促進其集體行為的社會網絡(Woolcock, 2002)。在本研究中社會網絡數量(QTSN)定義為以下三種社會網絡的總和：當你家庭有經濟困難時，有多少親友可以借錢的數目，有多少親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和你的家人，有多少信得過的親友。這量表有頗高信度($\alpha=0.76$)。

被訪者亦被問及在其最熟悉的親友之中，其失業與在業的數目對比以及其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更好還是更差。住戶社會網絡質量(QLSN)由這兩項目所組成。上述社會網絡數量及社會網絡質量指標是反映有關住戶與貧窮水平相關的社會資本的量度。由於調查時數據搜集的限制，所以本研究只能以社會網絡來定義有關住戶的社會資本的狀況，而未有量度住戶對社會及社區的參與水平。以社會網絡來定義社會資本，忽視了在社區層面所嵌入的社區資本以及其他在社會網絡之外的行為。

對被勞動力排斥的量度

社會排斥(SE)的量度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被排斥在勞動力市場之外，以及其他方面的社會排斥。上述對社會資本的量度在某程度上反映其他方面的社會排斥。被排斥於勞動力市場之外只是其中一種形式的社會排斥，但很多時這被視社會排斥的主要指標，尤其是在政策製訂的議題中。

被排斥於勞動力市場之外的量度是根據個人在過去兩年期的失業月數。「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ADXL)是住戶中所有21歲以上成人兩年內失業月數的平均數。「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YXL)住戶中所有15至21歲青年在兩年內失業月數的平均數。ADXL及YXL分別提供成人及青年社會排斥的量度。

結果

在本研究368個有青年的住戶中，其家庭入息中位數是\$15,000，其在職成員的中位月薪是7,833元。在這樣本中每戶的平均人數是4.2，高於在2001年人口普查所得的住戶平均人口3.1，這是由於我們在選擇樣本時只選取有青年成員的住戶，所以那些獨老及二老家庭並未包括入樣本之中。在368個住戶中，共有495名15歲至21歲的青年。而每戶所有的青年及在職青年1.4及0.4；而在職成人的平均數為1.7。那些在兩年內曾失業的青年，其平均失業月數為1.4月；而成人的平均失業月數為6.4月。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請參看下列表一：

表一：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

	<u>Mean</u>	<u>Standard Deviation</u>	<u>N</u>
貧窮水平(PL)	3.60	0.081	368
成人教育水平(ADEA)	2.73	0.048	364
青年教育水平(YEA)	3.99	0.045	368
社會網絡數量(QTSW)	6.36	0.306	368
社會網絡質量(QLSW)	6.06	0.089	367
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 (ADXL)	3.85	0.287	*341
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 (YXL)	3.07	0.538	*135

* 由於某些住戶中有部份成人及青年並未參與工作(如退休及在學人士)，所以其ADXL及YXL未能計算。這些個案便視為失蹤個案。

表二：主要變項的關係

	PL	ADEA	YEA	QTSN	QLSN	ADXL	YXL
PL	1						
ADEA	-.24***	1					
YEA	-.18***	.23***	1				
QTSN	-.21***	.13**	.04ns	1			
QLSN	-.20***	.13*	.13*	.27***	1		
ADXL	.27***	-.16**	-.19***	-.07ns	-.30***	1	
YXL	.09ns	-.09ns	-.16ns	-.07ns	-.28b	.26b	1

註: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ns = 相關不顯著

主要變項的相關係數見表二。與預計相符，住戶的「貧窮水平」與「成人教育水平」及「青年教育水平」均呈顯著負相關($p < 0.001$)，與住戶「社會網絡數量」與「社會網絡質量」亦呈顯著負相關($p < 0.001$)。住戶的「貧窮水平」只與「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相關而並不與「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呈顯著相關。這表示住戶的貧窮水平與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成人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相關，而較少與青年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相關。

使用逐步回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本研究分析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社會排斥等不同因素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各模型中各自變項的標準回歸係數(Beta)及模式的 Adjusted R Square 請參看表三。

表三：對貧窮水平的不同模型的線性回歸分析 (標準回歸係數 Beta)

	教育水平 (EA)		社會網絡(SN)		勞動力市場排斥(XL)		Adjusted R Square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ADEA	YEA	QTSN	QLSN	ADXL	YXL		
模型 1: EA	-.21***	-.13*					.07	1.49
模型 2: SN			-.17**	-.15**			.06	1.50
模型 3: XL					-.16	-.04	.02	1.37
模型 4 ADEA+ ADXL	-.21***				.24***		.11	1.43
模型 5: YEA +YXL		-.03			.09		.01	1.38
模型 6: EA +SN	-.17**	-.11*	-.12*	-.14**			.10	1.46
模型 7: SN+ ADXL			-.14**	-.10	.23***		.10	1.43
模型 8: EA + ADXL	-.19***	-.08			.23***		.12	1.43
模型 9: EA + SN+ ADXL	-.17**	-.08	-.13*	-.08	.20***		.13	1.41

Notes :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ns = non significant.

PL= 貧窮水平 EA=教育水平 SN =社會網絡 XL =勞動力市場排斥
 ADEA = 成人 (21 歲以上) 教育水平. YEA = 青年 (15-21 歲) 教育水平
 QTSN =社會網絡數量 QLSN =社會網絡質量
 ADXL =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 YXL =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

在模型 1，成人教育水平與青年教育水平均對住戶貧窮水平有明顯影響。這支持人力資本論，成人及青年的教育水平愈高，住戶的貧窮水平將愈低，而且，以成人的影響 (Beta = -0.21) 較青年 (Beta = -0.13) 為大。在模型 2，社會網絡數量與社會網絡質量均對住戶貧窮水平有明顯影響，這亦支持社會資本論的假設，有愈多數量及愈好質量的社會網絡的住戶，其貧窮水平將愈低。社會網絡數量 (Beta = -0.17) 較質量 (Beta = -0.15) 的影響力稍大。在模型 3，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及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對對住戶貧窮水平並沒有明顯影響，這可能是住戶中有青年曾失業的個案數目較少，所以有關歸因分析未能達至顯著的水平。基於此，在稍後的模型中，將會減去青年勞動力市場排斥的變項來作分析。

比較上述三個模式的預測能力，模型 1 的 Adjusted R Square 為 0.07 稍高於模型 2 的 0.06，而模型 3 的預測能力最低為 0.02。所以教育水平及社會網絡對貧窮水平的相對預測能力高於勞動力市場的排斥。

模型 4 及模型 5 旨在比較成人及青年的特徵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模型 4 顯示成人的教育水平及成人勞動力市場的排斥均對貧窮水平有非常顯著的影響($p < 0.001$)，而且以成人勞動力市場的排斥($\text{Beta} = 0.24$)的影響力大於成人教育水平($\text{Beta} = -0.21$)。模型 5 則顯示青年教育水平及青年勞動力市場的排斥均對貧窮水平並沒有顯著的影響($p > 0.05$)，青年勞動力市場的排斥($\text{Beta} = 0.09$)的影響力大於青年教育水平($\text{Beta} = -0.03$)，但兩者的影響力並不顯著，這亦可能與有失業青年的住戶的個案數目較少有關。比較模型 4 及模型 5，模型 4 的 Adjusted R Square 為 0.11 明顯高於模型 5 的 0.01。這顯示成人的特徵比青年的特徵對住戶的貧窮水平有更大的影響。

下列模型將分析不同因素的合成影響。模型 6 是模型 1 及模型 2 的合成，在模型中，成人教育水平、青年教育水平、社會網絡數量與社會網絡質量均對住戶的貧窮水平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模型 6 的 Adjusted R Square 為 0.10，高於模型 1 及模型 2，可見教育水平與社會網絡是兩組不同的變項對貧窮水平有獨立的影響力。模型 7 是模型 2 及模型 3 的合成，在這模型中，社會網絡數量對住戶的貧窮水平仍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在加入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後而社會網絡質量的影響變得不明顯，而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對住戶的貧窮水平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這顯示有部份社會網絡質量對貧窮水平的影響，是基於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的程度對貧窮水平的影響。成人失業的時間愈長，其社會網絡數量會減少亦出現同質化的情況，所以住戶的社會網絡質量亦會愈低，出現有關情況可以理解。而模型 7 的 Adjusted R Square 為 0.10，高於模型 2 及模型 3，可見社會網絡與成人勞動力社會排斥是兩組不同的變項對貧窮水平並有獨立的影響力。模型 8 是模型 1 及模型 3 的合成，在這模型中，成人教育水平對住戶的貧窮水平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青年教育水平在加入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對貧窮水平的影響變得不明顯。由於成人失業的時間愈長，青年有更大機會提前進入社會工作，所以其教育水平會較低。而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對住戶的貧窮水平則仍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模型 8 的 Adjusted R Square 為 0.12，仍高於模型 1 及模型 3，可見成人教育水平與成人勞動力社會排斥是兩組不同的變項對貧窮水平有獨立的影響力。

模型 9 加入所有變項，對貧窮水平的影響力依次是成人勞動力市場排斥($\text{Beta} = -0.20$, $p < 0.001$)、成人教育水平($\text{Beta} = -0.17$, $p < 0.01$)及社會網絡數量($\text{Beta} = -0.13$, $p < 0.05$)，在

這模型中，青年教育水平及社會網絡質量兩變項的影響力變得不明顯。

討論

上述有關不同變項對住戶的貧窮水平的分析顯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社會排斥」其中兩組變項的組合影響力比單一組變項為大，這顯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社會排斥」是三項不同的因素有各自對貧窮水平的影響力。在分析其對貧窮水平的相對影響方面，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影響力相若，而社會排斥的影響力較低，但這很可能是住戶中有青年失業的個案數目較少所至。此外，在分析成人一代還是青年一代的變項對住戶貧窮水平的影響時，成人一代的影響力明顯高於較青年一代的影響力。

近年，香港政府對於處理青年貧窮問題的主要策略是改善青少年的人力資本。香港政府積極地設立展翅計劃、毅進計劃以及青年見習計劃。這些計劃集中於發展青少年的人力資本，以作為解決青年與家庭貧窮問題的主要辦法。但現行的策略較少著重在住戶層面的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亦較少處理成人一代的人力資本發展與失業問題對住戶貧窮的影響。是次研究顯示這些因素均較青年一代的人力資本更能影響住戶的當前的貧窮水平。青年一代的人力資本發展可能長遠協助本身及家庭脫離貧窮，可惜是次研究並不是追蹤研究，所以無法分析有關因素對住戶長期貧窮水平的影響，這是本研究的不足。

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一個較全面的扶貧策略。政府的扶貧策略應同時集中貧窮的青年與他們父母的一代，而非單單將焦點集中於青年一代的貧窮問題，亦不應將大部份資源向青年一代傾斜，而忽視其建設上一代的人力資本及解決其社會排斥的問題。此外，政府不單集中於教育及發展人力資本的策略來扶貧，亦應兼顧社會資本的建設與及消除社會排斥。

而本研究提出要即時減低住戶的貧窮水平，最有效的策略是減低貧窮住戶中成人在勞動力市場的排斥，亦即時減低成人失業的機會及失業的時間，並增加其職業的穩定性。所以，現時政府要以發展經濟作為扶貧的主要策略是正確的方向，但是發展經濟必須是要以增加更多就業機會為前提，尤其是適合低技術及低學歷勞工的就業機會，減低這群勞工失業的機會及失業的時間。另外可參考歐洲的解決兒童貧窮問題的經驗，其重要策略是要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以鼓勵其參與有薪工作。歐洲的經驗改變了過去以男性為養家者的觀念，明白在後工業社會中，女性作為勞工及賺取工資者的重要性。而另一方

面，有工作的照顧者，仍對其子女有照顧的責任，所以他/她們可以在各項彈性工作安排中得益。而負稅制的安排，可以令低收入家庭可以維持一定的收入，長遠可以減少貧富之間的差距(Cantillon & Van den Bosch, 2003)。這些政策均是處理成人面對勞動力市場排斥的有效方法。

是次研究提出第二項有效的策略是提升成人的人力資本。可行的方法是要提供更多職前及在職訓練予成人，給予再次完成基本學歷的協助，加強對其人力資本的投資，並盡快完成資歷評審的機制，推動終身學習的體制及風氣，方能減低有關住戶的貧窮程度。現時已有不同的訓練及技能提升計劃，但由於低收入工人的工時過長，亦沒有足夠的假期參與終身學習，所以設立標準工時制度，並為所有勞工設立學習假期，是令青年及成人的人力資本可以繼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增加貧窮家庭的社會網絡數量，加強其社會資本的建設，則是本研究提出排行第三的有效的辦法。在社會資本建設方面，香港政府在2001年設立了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然而，基金成立的目標並非是解決貧窮問題，而是提倡廣泛地提倡社區參與、互助及支援以及社區共融。是次研究顯示要協助香港的貧窮住戶脫貧，必須有特別的政策與計劃有針對性去協助貧窮的住戶去改善其社會資本匱乏的情況。

香港的貧窮住戶雖然社會資本較非貧窮住戶少，但他們並不是生活在完全的孤立之中，他們仍有親密的朋友及親戚，這成為他們的連結(bonding)社會資本。但由於連結資本的數量較少以及同質性的情況較強，所以未能對青年一代提供足夠數量及質量的社會資本。在香港一個華人社會的脈絡中，家庭是培育連結社會資本的主要場所，所以「家庭友善」的社會政策如縮短過長的工作時間，父母與子女之間更好的了解及溝通，可以維持家庭培育連結社會資本的功能。

英國政府在推行兒童貧窮及跨代貧窮問題時，首相貝理雅在一九九九年便宣佈政府的歷史目標是在這一代人內要永遠消除兒童貧窮問題，而這是一代人需要二十年的努力。自一九九九年至今，英國經已有七十萬名兒童脫離貧窮。這是英國政府願景及決心以及一系列可落實政策的後果。若香港有一個願景，有一個消除兒童貧窮的目標和時間表。若有關政策以針對貧窮家庭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不足的問題，並解決勞動力市場所出現的社會排斥，香港的跨代貧窮問題亦可以消除。

參考資料:英文

- Berghman J. (1995).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olicy Contex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G. Room, (Ed.), *Beyond the Threshold*. (pp.10-28). Bristol: the Polity Press.
- Cantillon, B., & Van den Bosch, K. (2003). Social Policy Strategies to Combat Income Poverty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Europe. In P. Krause, G. Backer, and W. Hanesch, (Eds.) *Combating Poverty in Europe: The German Welfare Regime in Practice*. (pp.317-329). Aldershot: Ashgate.
- Children & Youth Team, the World Bank (2005). *Why Invest in Children & Youth? For a Children & Youth Focus in World Bank Oper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95-120.
- Costello E.J., Farmer, E.M., Angold, A., Burns, B.J., Erkanli, A. (1997).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American Indian and white youth in Appalachia: 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5), 827-832.
- Gordon, D., Nandy, S., Pantazis, C., Pemberton, S., Townsend, P. (2003). *Child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ristol: Policy Press.
- Hill, M.S., Sandfort, J.R. (1995) Effects of childhood poverty on productivity later in life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Child and Youth Service Review*, 17(1-2), 91 –126.
- Jones, C. , Clark, L., Grusec, J., Hart, R., Plickert, G. & Tepperman, L. (2002). *Poverty, social capital, parenting and child outcomes in Canada - final Report*. Applied research branch strategic policy, Quebec: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 Krueger, A.B. & Lindahl, M. (1999). Education for Growth in Sweden and the World.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6(2), 289-339.
- MacDonald, R., Marsh, J. (2002). Crossing the Rubicon: Youth Transitions, Poverty Drugs and Social Ex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13, 27-38.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sacharopoulos, G. (1988).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3(1), 99-116.
- Putnam,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aegert, S., Thompson, J.P., Warren, M.R. (Eds.) (2001).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hek, D.T.L. (2002a). Chinese adolescents'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the perceived causes of poverty scale. *Adolescence*, 148, 789-803.
- Shek, D.T.L. (2002b). The relation of parental qualities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0, 215-230.
- Wilson, W.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 (1), 11-17.

中文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0)。香港就業研究系列一。香港: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4)。貧窮化及貧富懸殊:香港的貧窮數據。香港: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4)。香港統計年報 2003。香港: 香港政府統計處。
- 黃洪及李劍明(2001)。香港貧窮線研究。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